



日本

研究丛书

政治体制与 经济现代化

“日本模式”再探讨

王新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日 本 研 究 丛 书

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

——“日本模式”再探讨

王新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王新生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

(日本研究丛书)

ISBN 7 - 80149 - 387 - 7

I. 政… II. 王… III. ①政治制度 - 关系 - 经济发展 - 研究 - 日本 - 现代②政治制度 - 研究 - 日本 - 现代
IV. F13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567 号

· 日本研究丛书 ·

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

——“日本模式”再探讨



著 者：王新生

责任编辑：杨 群

责任校对：苏 晋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0.75

字 数：259 千字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49 - 387 - 7/D · 089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绪 言

一 问题的提出

本书通过具体分析战后日本发展历程来探讨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意识，起源于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这场金融及经济危机的影响波及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甚至连日本、韩国这样的经济发展优等生也未能幸免。与20世纪80年代该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相对照，90年代后半期却处在衰退之中。此次危机将一个古老的话题重新提出来，这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有人认为东亚金融及经济危机是政府管得太多的缘故，结果造成市场的调节功能没有发挥出来。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沃尔夫认为东亚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不利用市场力量调节经济”。他说，“以市场为中介来进行资源配置，固然有其缺陷，但这并不意味着亚洲模式的主观人为地配置资源就没有更大的缺陷”；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东亚危机是政府管得太少，以至于市场处在混乱状态。例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这些国家今天所以面临许多困难，并不是因为政府管得太多，而是管得太少了。例如，有些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疏于管理，并撤销了原有的某些限制，包括不允许银行在

没有健全的法规下向房地产业贷款等。”^① 两种观点各持一端，争论不已。但从世界银行组织在东亚爆发金融危机各国采取的改革措施来看，其提出的削弱政府职能、扩大市场作用的药方并未充分奏效。这不仅显示出东西方传统文化、社会结构、意识形态、行为模式的差异，而且作为后进型的或追赶型的现代化国家，依靠政府集中并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由此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可能是一个必由之路。但是，政府职能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减弱，否则将会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正如战后日本从60年代的“经济奇迹”到90年代的“经济衰退”那样。因此，探讨战后日本政府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就有可能为目前正在进行现代化的东亚地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经验及教训。

另一方面，在谈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国内外大多数论著只是将行政机构作为研究的对象，而忽略了立法机构^②。勿庸置言，“政府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府泛指行使国家权力的所有机关，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狭义的政府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通常是指中央政府”^③。但在实行三权分立的日本，仅仅分析其行政机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够的。即使是备受推崇的、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第三种观点——“市场增进论”也存在着相关方面的不足。正如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市场增进论”认为“政府政策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功能”，它“所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政府政策的目标被定位于改善民间部门解决协调问题和克服其他市场缺陷的能力”。

① 《经济日报》1998年7月31日。

② 参见严善平《日本经济中的政府与企业》，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杨栋梁：《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③ 李敬德、连俊沛主编《当代世界政治体制比较》，第75页，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

虽然“市场增进论”在这里分析的政府是大政府，因而“政府”与“国家”交替使用，然而，该观点却没有深入分析各个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①。尽管从表面上看，作为各政党活动舞台的日本立法机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 70 年代以前）并不那么突出，这亦是日本为“一流经济，三流政治”说法的根源。实际上，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因为在一个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型的国家里，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绩，那么其各种权力相互制约平衡的政治体制也应当是较为合理的，至少对经济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反过来讲也是一样，日本经济在 90 年代的衰退同其政治体制亦具有密切关系。因此，本书主要通过分析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发展、演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即所谓的“日本模式”，以期对东亚各国国家权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出合理的解释。

二 概念的界定

为更好地说明所要阐述的问题，并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混乱，在这里，对本书的关键词汇“政治体制”、“55 年体制”、“经济现代化”、“政府”加以粗略的界定。

何谓“政治体制”，这在现代政治学起步较晚的中国，存在着较大的混乱，尚未出现权威性的定义。例如 1982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写道：“政治制度：亦称‘政治体制’，通常是指有关政体的制度。”1984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学常见名词浅释》写道：“政治制度：亦称‘政治体制’，即政体。”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学》

^① 参见世界银行青木昌彦等《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写道：“一般地讲，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政体制度以及政权的组织形式都是同义语”，“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亦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即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制度”。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政治体制改革漫谈》认为，“政治体制简称‘政体’”。这些早期的书籍均将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等同起来，显然是不恰当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政治学辞典》写道，政治体制“是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国家意志，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所采取的管理形式、机构设置、实际措施等等多种具体的制度”，“在一个国家中，各种具体的政治体制是受根本的政治制度制约的。反过来，政治体制的合理与否也影响着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实施和巩固”，“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在政治生活过程中的具体化，同政治制度相比，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更为直接”。该观点对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关系的论述是准确的，但将政治体制看做是“具体的制度”似乎有些勉强。

1988年出版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探讨与争鸣》一书在列举了6种有关政治体制的表述后，认为多数论者对这一概念的阐述普遍不够系统和全面，指出刊登在《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5期的《论政治体制的内涵和结构》一文对“政治体制”的涵义进行了较为系统和颇有新意的阐述。该文给“政治体制”所下的定义是：“政治体制是国家制定的政治机构行为方式的规范体系与国家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形式的规范体系的总和。”^①“规范体系”一词较为贴切，但将国家机构与国家公民并列起来并非合适。

1997年出版的《当代世界政治体制比较》是专门研究政治

① 李英华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探讨与争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述要》，第9页，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

体制的书籍之一。该书对政治体制的解释是：“政治体制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范畴，属于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一定社会的政治体制，是该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总和。它以政治权力的配置为中心内容，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为主要职能。它是一个由各种具体的政治制度、政治设施、政治规范和法律规范而成的复杂的社会政治体系”，“政治体制的中心内容是政治权力的配置和运用”，其具体包括选举制度、议会制度、行政管理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党体制、公务员制度、社会团体等内容^①。这个定义将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区别开来，强调体制的变革并不等于制度的变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次一级水平上却将两者的功能混淆起来。例如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是有关具体领域的政治制度，将其看做是政治权力配置与运用的政治体制的内容似乎不太恰当。

1998年出版发行的《当代各国政治体制——日本》一书也存在类似问题。虽然书名为政治体制，“政党”一章也论述了“55年体制”，但从该书的整体内容来看，不仅大部分内容论述的是政治制度，而且“制度”与“体制”也是混同使用的。另外，该丛书的主编前言明确写道，这套论述当代各国政治体制的丛书是为弥补至今国内尚未出现一套全面介绍当代世界政治制度丛书的缺憾而决定编辑出版的。^②

在本书的研究对象国日本，关于政治体制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例如政治学家田口富久治认为：“‘政治实体’或‘政治体制’的定义是：以拥有某些自主性的共同社会的公共权力或权威（这是共同社会的共同或共通的课题）为中介进行决策或加以实

① 《当代世界政治体制比较》，第7～11页。

② 刘小林：《当代各国政治体制——日本》，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施的社会单位。”^① 山口定则认为政治体制的构成要素有五点，即支撑体制的正统性原理；通常能够掌握政治发展的主动权的“政治精英”（“统治精英 governing elite”又在其中占核心地位）的构成及其招募系统；与国民（即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意志的表达和政策形成（即“系统论”中所说的输入部分）有关的制度以及机构（如选举制度、政党和利益集团的配置结构、议会制度）；由军队和警察组成的物理性强制力量的作用和结构；“政治系统”（或国家）对“社会”进行组织的机制（即“系统论”中所说的输出部分中的以官厅系为代表的已制度化的要素和主要公共政策，特别是国民的权利保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劳动政策和教育政策）^②。

实际上，在我国所用的“政治体制”一词来自英文中的“political system”，但该词也翻译成“政治体系”、“政治系统”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的政治学名著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其中文版的名字为《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但如果按照山口定在其《政治体制》一书中的解释，伊斯顿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将“政治系统”的构成要素归纳为以下三种，即“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政治体制”（political regime）、“政府”（government）。另外一位美国著名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认为：“政治体系不仅包括政府机构，如立法机关、法院和行政部门，而且包括所有结构中 with 政治有关的方面。其中有亲属关系、社会等级集团等传统结构，还有诸如动乱之类的社会非正规现象，以及政党、利益集团和大众传

① [日] 田口富久治著、耿小曼译《当代世界政治体制》，第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② [日] 山口定著、韩铁映译《政治体制》，第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

播工具之类的非政府组织等。”^①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有关“政治体制”一词尚未有统一的定义。但总的看来，国内有关政治体制的定义尚不全面，大多未能涉及深层次的权力问题，而国外某些学者对政治体制的解释又有些复杂化，几乎将各种政治现象均包括在内。

笔者认为，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运用的形式，也就是政治权力配置和运用的形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是各个政治主体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及权力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即各个政治主体或政治行为者（主要是行政官僚、以立法机构为舞台的政党以及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乃至军队等）按照制度上的规定或约定俗成惯例行使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力，以便保护或者扩大自己的利益及权限。从形式上看，这些政治主体或政治行为者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按特定的结构组成一个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有机整体，有规则地运转着。

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即政治制度是政治主体活动的规范和框架，是一个政治体制得以有效运转的基础，两者如同电子计算机中“硬件”与“软件”的关系一样。因此，政治制度是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则是相对灵活的，而且有时也会在制度所规定的范围内加以约定俗成的变动。例如，尽管《日本国宪法》规定“国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是惟一的立法机关”，但行政官僚却过多地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再如，该宪法并没有具体规定政党以及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及其作用，但两者的活动却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影响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讲，体制比制度更为重要，而且体制的变化频率较高，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演变，尽管此时的社会形态以及社会制度尚未发

① [美] G.A.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第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随意使用“制度”或“制度的创新”是不恰当的。

所谓“55年体制”即“55年政治体制”，首先，大体上是指从1955年到1993年以保守势力支配下的自民、社会两党竞争为基本特征的日本政治体制，也可以称其为战后日本政治体制。因为从1945年日本战败到1955年左右社会党统一、自民党成立是战后政治体制的形成时期，而1993年自民党下台以后至今则是向新的政治体制过渡时期；其次，从时期划分上，本书将“55年体制”大致划为两个阶段，即以70年代为限，在此以前的“55年体制”带有竞争性政党政治、官僚主导决策过程下的经济发展模式、生产性利益集团发挥较强政治影响力等特征，对经济发展以积极作用为主；70年代以后的“55年体制”发生较大变化，其特征转化为协调性政党政治、执政党与行政官僚相互利用、消费性利益集团发挥较大政治影响力等，对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逐渐增大，并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经济的现代化，因而称其为“后55年体制”；另外，尽管大多数日本政治学者是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论述“55年体制”的^①，但正如前面对政治体制所下的定义那样，“55年体制”的内容不仅仅包括政党政治，而且还包括拥有巨大权限与支配性资源的行政机构官僚、以拥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财界”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以及政党、官僚、利益集团三个政治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作用。虽然以报纸、电视、电台、杂志为中心的大众传播媒介越来越具有政治影响力，甚至有的学者将其看做是排在政党、官僚、利益集团之后的第四种政治势力，但大众传播媒介仍难构成一个按照有关规则行动的政治主体。因此，本书暂不将其包括在内加以论述。

“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其内容经常发生变化的概念，因为人

^① [日] 鸟海靖等：《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事典》，第359页，东京堂，1999。

类社会永远处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因此，这一概念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经济发展水平，即各种经济发展指标均处在世界领先地位；其二是为下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奠定良好的基础，即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 70 年代以后日本的各种经济发展指标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但并没有为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创造体制上的必要条件，因而目前的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实现经济的现代化。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论述的“政府”指狭义上的政府，即行政机构。

三 理论与方法

在课题研究的理论运用上，本书主要是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历史性地分析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从中探讨有关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规律性。用恩格斯的话来讲，“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之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①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政治权力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经济行为中，于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成分逐渐增加。如果说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以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利益，而政治学关心的则是如何分配那些业已由经济活动生产出来的利益。因此，政治与经济处于不可分割的互动状态。正如林德布洛姆所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86 页，人民出版社，1972。

的那样，“鉴于多种理由，在分析基本的社会机制和制度时，必须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政府的主要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性的，如税收、国防、教育、能源保护和行政管理、交通运输和讯息传递、社会保障、经济稳定，以及推动增长”^①。以《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而闻名的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进一步将这种观点理论化，“通过制度和有利于此集团或彼集团的那种使规则制度化的斗争，政治和政治选择就构成了经济过程的运行方式”；“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各种经济力量如何在没有制度的条件下相互作用，政治经济学则研究经济理论如何通过制度而得以实现”^②。本书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借鉴上述理论或学说，具体分析构成政治体制主要内容的政治主体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与权力，以及政治主体之间的互动对经济运行方式乃至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课题的研究方法上，本书将沿着两条主线加以展开，即一条主线是对不同时期的“55年体制”的论述，第二条主线是分析不同时期的“55年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两条主线交叉进行。由于篇幅的关系，难以全面展开，仅将全书分为六个主要部分，分别分析“55年体制”的形成、功能、变异、终结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第一章分析构成“55年体制”主要内容的政党政治是如何形成的，第二章与第三章分析各种政治权力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何种途径推动经济发展的，第四章与第五章分析“55年体制”在进入经济低速增长之后，发生何种变化并逐渐变成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的，第六章

① [美]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第8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② [美] 查默斯·约翰逊：《日本政治经济学研究概况》，载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编《美国的日本研究》，1988。

分析日本目前进行的政治、行政、国会改革将使其政治体制发生何种变化,以及将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另外在结束语部分,从比较现代化的视角,分析在包括日本在内的追赶型现代化的东亚各国中,其政治体制的应有状态、重要作用及其必要的变化趋势等。

四 课题的意义

首先,本课题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弥补国内外学者对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不足的选题意义。

作为当事国,日本对“55年体制”即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研究最多,成果也最为丰富。在“55年体制”的形成时间上,多数日本学者主张以自民、社会两党各自统一的1955年为起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55年体制”用语的创始人升味准之辅。1964年6月号的《思想》杂志刊登了升味准之辅的论文《1955年的政治体制》,该论文经过作者的修改后,收录在1969年出版的《现代日本的政治体制》一书中,结果使“55年体制”这一词汇为日本政治学界所接受。升味这篇论文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如果有人问到现在的政治体制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是1955年。即这一年秋天进行的社会党统一和保守党合并,构成了现在的政治体制的框架”。

升味准之辅的观点成为日本学术界多数学者的共识,直到90年代出版的政治学著作仍坚持该学说。例如,“1955年社会党两派联合,与之对抗,自由、民主两党也实行了保守合并,由此形成了所谓55年体制”^①;“1955年10月,分裂为左右两派的社

^①〔日〕日本政治学会编《55年体制的形成与崩溃》,第2页,岩波书店,1979。

会党取得了统一。接着 11 月，自由党和民主党进行合并成立了自由民主党。这一事件对以后的日本政治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成立的政治体系称为“1955 年体制”^①。

关于“55 年体制”的终结问题，在 70 年代，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交通状况恶化、环境污染严重、住宅拥挤不堪等问题使国民对长期执政的保守政党产生不满情绪，以大城市市民为中心的选民大多将选票投向了当时被称做“革新政党”的社会党或者日本共产党，因而较多的地方自治体议会和行政首脑为社会党或日本共产党所掌握，于是这些地方自治体也称作革新自治体。同时，自民党因分裂在 70 年代后半期的两次大选中均未超过议院半数议席，出现在野党联合政权的可能性骤然增加，因而学术界也出现了“55 年体制”将终结的观点，日本政治学会为此在 1979 年编辑出版了《55 年体制的形成与崩溃》一书。但后来的政治发展并非如此，因而日本政治学界一般将 1993 年自民党的下台作为“55 年体制”的终结。

在有关政治体制的内容和特征上，日本学者的研究大多围绕在政治过程或决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政治主体展开的，因而其主流派观点也从 60 年代的“官僚优势论”转向 70 年代末的“多元主义论”。下面按年代顺序分别加以介绍。

虽然“55 年体制”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升味准之辅 1964 年发表的论文《1955 年的政治体制》，但对其体制进行研究却是在 60 年代初。这是因为“55 年体制”确立以后，自民党巩固了一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其政治家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各种压力集团也不断出现，并以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决策过程，因而分析各政治主体在决策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便成为日本政

① [日] 阿部齐等：《概说日本现代的政治》，第 136 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

治学界的热门课题。例如在 1960 年，日本政治学会就编纂出版了题为《日本的压力集团》专集，1967 年该会又编纂出版了《现代日本的政党与官僚》。这些由当时的著名政治学者石田雄、田口富久治、升味准之辅、永井阳之助、筱原一等人执笔的论文，虽然其特点是以 50 年代形成的“官僚优势论”为基本思路研究政党、国会和利益集团。但因其研究的对象扩大到官僚之外的政治主体，而且分析的重点也转移到经济高速增长前期的政治，从而对 50 年代的“官僚优势”理论模式加以修正。也就是说，60 年代的大多数政治学者将官僚的熟练专业能力同政党的弱体化以及国会功能的下降对应起来，从而使官僚优势的基础从战前的特权性转变为专业性。

具体说来，就是日本政党的基础组织脆弱，而且缺乏为制定政策进行调查和立案的专家机构，因而长期以来不得不在资金上求助于财界和工会团体，在政策课题调查和立案上依靠官僚。例如自民党政务调查会各部会和官厅机构相对应，高级官僚出席其会议，双方协商制定政策，而且高级官僚往往是自民党议员的后备力量。在这种政党（自民党）与官僚在制度和人际关系上日益结合的情况下，决策是通过自民党调会和高级官僚的协商进行的，因而国会的常设委员会及其审议就只能流于形式。归纳起来，1955 年保守党合并后决策机构上产生的变化为以下四点：①促使国会机能降低；②官僚与执政党——自民党的关系密切化和公开化；③内阁在决策上失去权威，尤其缺乏综合调整机能；④财界对政府政策的发言权增强、与执政党的结合制度化等。但无论如何，此时决策过程的基础依然是官僚制。

当时也出现了“多元主义政治理论”的雏形。也就是在决策过程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虽然工会等利益集团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自民党内部派系对立、官厅之间的对立、财界各团体的不协调等现象，仅以“官僚优势论”是难以解释的。例如

升味准之辅就将决策模式划分为“通常形态”以及“异常形态”，前者是指“所得倍增计划”、地域开发所代表的政治过程，这种模式在大小不等的规模上反复出现。在这里，省厅之间的对立、党内派系的对立、选区与压力集团的陈情等“有限多元主义”要素发挥作用。与此相反，在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异常形态”中，政治过程的“有限性”消失，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对立、群众运动的主导性、自民党内反主流派对主流派的批判、财界的介入等遂成为政治过程的重要内容。当然这种“异常形态”是少有的现象，动乱之后就恢复到“通常形态”。另外在《现代日本的政治体制》一书中，升味准之辅利用详细的统计资料，分析了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对投票行为产生的影响。升味认为自民党国会议员组织的个人后援会、与利益集团保持密切的关系、以中央省厅为媒介的利益分配等均起到巩固自民党选举地盘的作用。由此形成的利益政治结构支持了自民党统治的稳定，而利益政治所需资金来源于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富裕财政和企业的捐款。但在这里，升味并没有将经济高速增长看做是自民党政权及其政策所起的作用，相反，自民党充分利用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果实，为其后金权政治或政治腐败埋下了伏笔。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60年代对政治体制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还有田口富久治的《社会集团的政治功能》、上林良一的《压力集团论》、筱原一的《现代政治力学》以及石田雄的《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等，这些著作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的观点。即：①在日本政治过程以及利益集团体系中存在着主系和旁系两个系列，即自民党与官僚机构密切结合，使以自民党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机制固定化，其结果大部分利益集团与自民党一体化，而劳工集团和市民团体等则明确属于另外一个系列；②日本的利益集团和政党缺乏作用的替代性以及功能性结构；③社会团体成立时存在依赖既成集团的结构，集团内部存在委托式领导人，其政治地